

一门忠烈

廖氏家族

吴学文
王俊彦 著

下



中共党史出版社

K820.9/50

一门忠烈

廖氏家族

(下)

吴学文 王俊彦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作者简介

王俊彦 1943年1月生于河北省元氏县。1965年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度过22年军旅生涯，之后在担任出版编审工作之余，长期致力于中国外交史研究和外交题材的纪实文学及人物传记创作，中国作协会员。

主要作品有：

《日本侵华史系列纪实》6卷

《民国外交演义》

《新中国外交演义》

《中美苏三国演义》

《中美外交传奇》

《元帅诗人外交家陈毅》

《铁锤外交家莫洛托夫》

《外交长青藤葛罗米柯》

《铁血沙龙》

《白俄中国大逃亡纪实》等

责任编辑：黄 艳

封面设计：与天静

第十五章 推动和发展中日关系

一、对日工作的重要角色

1950年3月9日凌晨，中南海西花厅的灯光久久未息。

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向周恩来总理汇报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策划释放日本战犯，派日本顾问团15人到台湾与蒋介石密商，组织所谓“日本志愿军”到台湾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等问题，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和新华社要组织几篇文章，表明新中国的严正态度。

李克农说他准备与新华社联系，针对麦克阿瑟释放日本战犯问题，发表《麦克阿瑟释放日本战犯的罪恶纪录》、《梅汝璈斥责麦克阿瑟释放日本战犯的谈话》、《麦克阿瑟指使日本战犯继续侵华的罪行》等三篇文章。李克农手推眼镜为难地说他手下缺少懂日本问题的得力干部，因此遇到不少棘手问题难于处理，周恩来便让李克农请教廖承志。

原来，周恩来考虑到新中国面对的审判日本战犯、帮助日侨回国、对日和约等一系列对日问题，已经指示廖承志成立了一个研究日本问题的小组，作为他的日本问题智囊机构。李克农大喜，赶快请教廖承志，果然名不虚传，发现此人对日本问题的见识、对日本国情的了解，可谓深谋远虑，有他做日本问题的顾问，有关涉及日本问题的处理就顺当多了。

1952年4月1日凌晨，廖承志再次被周恩来请到西花厅。周恩



来让他看一份党内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和有关中日关系问题的宣传解释文件，只见毛泽东明确批示处理日本问题的关键所在：

“要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要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

周恩来等廖承志看完文件，就以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廖承志，仔细交代说：

“毛主席的指示就是中央决定的对日方针。中央决定开展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日本方面的问题决定由你兼管。南汉宸和雷任民到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按原定设想已经邀请了日本代表访问北京……接待工作由你从日本小组里派两个人负责。”

原来，廖承志在做国家侨委、青年联合会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及保卫和平等方面工作的同时，也密切注视着日本的形势发展变化。廖承志认为如何处理新中国与东邻日本的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从此，廖承志参与制订对日政策，并率领对日工作的群体，开始了中日民间外交。

廖承志带领他的日本小组，从1952年开始接待一批又一批日本客人。

一次，送走一批日本客人，胜利完成接待任务的中国工作人员个个喜气洋洋，廖承志伸手向孙平化头上一揉，孙平化精心梳理的分头，一下变成了乱草窝，逗得众人哈哈大笑。廖承志对孙平化眨了眨眼幽默地说：“老孙，你还真有点水平，讲出了日本人也听不懂的日语！”

这位为人忠厚的东北人被说了个大红脸。原来在日前欢迎日方代表时，孙平化由于多年不用日语，说的日语高良富三人听不懂，幸亏冀朝鼎反应极快，用流利的英语出来解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廖承志重提此事，孙平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廖公，我检讨……”

廖承志哈哈大笑：“老孙，你有什么可检讨的？要我看，还应该为你立一功！”

孙平化被抛入五里雾中，廖承志嘿嘿一笑揭开谜底：“你给我一个提醒：赶紧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广招天下圣贤，组织一个日语口语过硬、熟悉日本国情的强有力的翻译队伍，今后我们与日本打交道，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接见时的翻译，都要有第一流的水平。老孙，做日本工作，可不是一时一事，你我准备干上一辈子，好不好？”

孙平化欣然响应：“好，我决心干一辈子日本工作！”

于是，廖承志千方百计从各单位挖掘适合对日工作的干部，在延安就从事对日宣传和教育俘虏工作的赵安博、王晓云和熟悉日本国情的孙平化、肖向前成了廖承志的“四大金刚”；日语流利的王效贤、林丽韞等人很快汇集到廖承志的麾下，周恩来指示建立的日本组，变成了中国负责对日事务的参谋部，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书作者之一吴学文1952年10月开始在廖承志领导下参加对日工作，一见面廖承志就颇为风趣地问道：“喂，小孩，你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

吴学文已是29岁的大小伙子，听廖公亲切地称自己小孩，感到既吃惊又亲切，便微笑点头。在吴学文的眼里，廖承志是大人物、高级领导同志，但却平易近人，一点都不摆架子。

廖承志一拍巴掌含笑吩咐：“小孩，你搞日本工作很好，对日工作是长期的，你要准备干一辈子！”

“一辈子？”不到30岁的吴学文感到那是遥远的未来，谁想到廖公一句话就决定了他毕生为之努力的方向。

周恩来有一次召集日本组人员开会，发现这些人年岁不大，但是大都有些谢顶，便笑着问道：“你们这些人怎么头发都秃啦？”

“都叫日本人给拔去啦！”廖承志含笑回答，又摸着孙平化的



一

门
忠
烈

廖
氏
家
族

秃顶对周恩来夸奖说，“变化无穷独一人，这是个孙悟空！”

孙平化、肖向前等都了解他们的主帅除有在日本长期生活的经历外，每天不管多忙，晚上在床上阅读大量日文和港台报刊是雷打不动的必做之事，看完一张扔一张，宛如天女散花一般，才赢得了中国头号“知日派”、“中日关系第一人”美称。

1954年12月，国务院外交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决定扩大日本研究工作，1955年成立了对日工作委员会，负责对日本问题的研究、对日政策的计划和实施。该委员会主任为郭沫若，副主任为廖承志、陈家康、王芸生；委员有雷任民、李德全、刘宁一、南汉宸等，廖承志为实际负责人。

廖承志重视对日本组成员的言传身教，作为培育对日工作队伍的重要措施，要求接受任务的人每天晚上都到王大人胡同家里向他汇报，接待工作是否按计划进行，日本客人是否满意，出现了什么问题又是如何办理的。廖承志边听边指点边讲评，哪些是做对了，哪些是做错了，哪些又应当如何做。既放手使用，又严格要求，鼓励他们勇于工作，大胆负责，使这些年轻人受到教育，得到锻炼。

因此，孙平化、肖向前、吴学文等觉得在廖承志领导下工作是愉快的，同时也最能磨炼头脑。廖承志讲情况谈工作，常常是妙趣横生，爽快夹着幽默，他们有时是在欢笑中接受工作任务的，但思想上可不轻松，对他那闪电般的思路洞察、抓重点、定策略，总是感觉到脑子跟不上。因此要自我鞭策紧跟，自我强迫能举一反三或举一反三。后来逐渐习惯成自然，为学到知识而愉快地完成工作任务。

常言说强将手下无弱兵，日本组的人员都以廖承志为榜样，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工作，才取得对日工作的高效率。

日本朋友从与日本组人员的接触中，早已摸到一条“高效通天的秘诀”：凡遇到中日之间的疑难棘手问题，只要一找孙平化、

肖向前，当天就会传到廖承志耳朵里，有些问题廖承志就能拍板决定，重大问题则会直接请示周恩来，也就一步通天得到多快好省的解决。肖向前在《为中日世代友好努力奋斗》一文中，以几十年的亲身体会对日本组有极其生动的记述：

“众所公认，廖公的日语比一般日本人还好。他出生在日本，读过中学之后才回国，看过许多日本的传统小说、神话故事等，同日本朋友谈起话来不仅谈笑风生，而且是妙语连珠。他对日本历史和国际形势比我们了解之多更是无法相比的，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工作，是一种又害怕、又放心的感觉。平时他不仅平易近人，而且爱开玩笑，在他周围工作的人，都有一个他起的绰号。他不叫我们本来的姓名，也不称什么同志，只是绘声绘色地叫诨名。对年轻得多的同志则动手摸摸他们的脑瓜，拍拍他们的前额，简直是随便极了。跟他一起工作，使你不会感到寂寞，但是到了安排工作，进入角色，需要负责到位时，他就十分严肃起来，特别是碰到有谁任务完成得不好，不按他部署的就位时，他也会大发脾气的，好在这种时候究竟不多。当然越是离他较近或责任较重的人，更易于尝到他发脾气的滋味。”

吴学文认为，虽然没有“对日本工作的机制”这样的正式说法和组织，但他在几十年的对日工作中，亲身感受到确实有这样的机制：毛泽东亲自决定中日关系中的重大方针，周恩来亲自制定对日政策，并带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廖承志主任组织执行。

中共中央的涉外工作中有个外事小组，陈毅任组长，廖承志为副组长。国务院设有外事办公室，由陈毅任主任，廖承志为副主任。外事办公室下面设立日本组，先后由杨正、王晓云任组长，组内有几名工作人员。最初由廖承志召集与日本有关的各部门涉外干部开会，后来日本组起到召集人作用，会议多在廖承志主持下召开，由廖承志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日本问题的指示，然后结合日本形势讨论落实，形成了上情可以迅速下达，下情可



以迅速上报，会议的决定可以落实行动，行动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及时解决的制度。

据吴学文记忆所及，参加人员1955年以后相对固定，包括外交部、中联部、外贸部、国家侨委、国际贸易促进会、对外友协、外交学会、共青团中央、总工会、《人民日报》、中央广播事业局、新华社等单位约有30人，其中十几人是基本的班子，其他人根据需要决定。

在廖承志主持下，学习中央对日方针政策是重点中之重点；结合讨论形势，开展民间外交是重要内容；每当日本政局发生变动、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或曲折时，外办日本组都要召开会议，讨论形势研究对策，既务虚又务实。

参加会议的同志与本部门的对日工作直接联系，并根据本部门的需要由部门领导确定计划与执行，这虽然与外办日本组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但由于日本组可以“通天”，可以及时转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图和意见，所以对有关部门的对日工作具有指导性和权威性。

因此，外办日本组召集的会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日工作班子，虽然不是正式的组织系统，也没有正式的机构名称，但是与会者都能基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周总理亲自关怀日本工作和制定对日政策的崇敬和爱戴，对廖承志同志的爱戴和他领导艺术的心悦诚服，对从事对日工作的使命感和光荣感，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机制。

这个机制既能体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对日工作方针，又富于行动力和实践性，从而可以迅速而有效地发挥各部门对日工作的积极性，因此具有独特而无比巨大的力量^①。

^① 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7页，第55-71页。

二、冲破经济封锁

1951年10月的一天上午，南汉宸特意到北京王大人胡同拜访。

廖承志热情地接待了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此人1895年生于山西洪洞县，参加过辛亥革命，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在西北军杨虎城部队做统战工作，后任延安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

廖承志称赞南汉宸曾经巧妙地利用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中的合法地位，多次营救和掩护党的高级干部脱险，他的大智大勇故事广泛流传。

南汉宸苦笑着说好汉不提当年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中国银行董事长的新职务，使他感到很吃力，这次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国际经济会议发起人会议，搞外交活动心里无底，特来向喝过洋墨水、会五六国语言的廖承志讨教。

廖承志热情地介绍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四五个月里，日本社会活动家铃木一雄、日本社会党议员帆足计、日产重工会社社长箕蒲多一等有识之士，鉴于中国革命成功的大局已定，认为“日本的景气始于日中贸易”，“没有同邻邦中国的贸易，就不可能建设和平的日本”，便率先行动起来，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中日贸易会”；廖承志看到帆足计等20人在日本参议院提出《关于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案》并获得通过，认为这是战后日本国会通过的第一个有关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决议案，他感到对日工作大有希望。

廖承志称赞日本朋友积极活动，1950年4月签订了日本购买



一

门
忠
烈

廖

氏

家

族

中国九万吨食盐的合同，由香港租船从天津把食盐运到北九州，食盐成为日本从新中国输入的第一种商品。其后，中国以大豆、煤炭、铁矿石、食盐换取日本的钢材、电动机的贸易逐步展开，但却被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所打断。

廖承志说他协助贸易部门寻找新的机会，国际经济会议使他看到了希望。

廖承志给南汉宸讲了日本的有关情况，请他注意找机会与日本代表接触，设法打开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南汉宸在参加国际经济会议的筹备会后，回国与廖承志谈了筹备会议的顺利进展，决定1952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正式会议，但是筹备会议没有日本代表参加，怎么办？

廖承志建议由南汉宸向日本大阪商船会长村田省藏、函馆船坞会长加纳久郎、亲和银行行长北村德太郎、原大藏大臣石桥湛山等日本经济界10位实力人物发出邀请，希望日本能派代表出席莫斯科会议，与各国代表共聚一堂讨论发展贸易问题，届时商讨开展中日贸易问题，打开中日民间交往的渠道，让水流动起来，南汉宸极为赞成，便向总理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报经毛泽东批准，召见即将前往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正副团长南汉宸、雷任民面授机宜，南汉宸就向村田省藏等10个日本著名人士发出邀请，希望日本经济界人士、政治家和学者出席莫斯科经济会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担负落实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的重任。

廖承志密切关注着中国发出邀请后日本方面的反应，得知日本方面积极响应，石桥湛山、村田省藏1952年1月24日组成日本国际经济恳谈会，日产创始人鲇川义介、帆足计、箕浦多一、西园寺公一、风见章、大山郁夫等各界知名人士踊跃参加，研究中日经济关系和东西方贸易问题，廖承志便不失时机促使中国有关方面再次邀请日本派出民间经济代表参加莫斯科经济会议，届时

商谈中日贸易问题。

帆足计、宫腰喜助、大山郁夫等19人很快向日本外务省提出申请前往莫斯科的护照，但却被拒绝，南汉宸和廖承志都极为失望，但是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开幕的第三天出现了奇迹，日本代表高良富到了莫斯科。

廖承志从他的小组搜集的资料得知，高良富女士是个基督教徒、参议员，早年留学英国，曾经访问过鲁迅，得到鲁迅“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的赠诗；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她英勇无畏地从事过反战和争取和平的运动；战后当选参议员，从事国际和平、妇女和文教等方面活动，与印度圣雄甘地、大诗人泰戈尔结识，担任过日印协会、甘地和平联盟等团体的副会长，被称为善操英语的社会活动家。她是借到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市民建设服务联络会议之机，经丹麦到达莫斯科的。高良富身穿和服在会上发表了促进日本从中国和苏联进口煤炭的演说，深受中苏和各国代表的欢迎。

令南汉宸和廖承志感到高兴的是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结束两个星期后，帆足计和众议员、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理事长宫腰喜助也经丹麦到达莫斯科，雷任民与三人就中日贸易等问题进行多次彻夜友好会谈，都同意在“互惠、平等、和平、友好”的基础上进行贸易协商，至于具体的贸易协议，中国邀请日本代表访问中国详细拟定，雷任民打电报请示国内，很快得到批准。

周恩来便召见廖承志，说明中央已经明确由廖承志负责有关日本的工作，可以在北京饭店设立办公室，把接待帆足计等三位日本代表的任务，交给了廖承志和他的日本小组。

廖承志、南汉宸召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冀朝鼎、中国进出口公司副经理倪蔚庭和日本小组的孙平化、肖向前、林放等人商量谈判和接待问题。

廖承志翻阅着日本客人的花名册，称赞高良富三位客人有勇



气毅然冲破日本政府的阻挠应邀访华，堪称首批开拓中日航道的先行者，他极富鼓动性地说：

“诸位，请记住，在中日关系史上，应该留下他们的名字：帆足计，日本社会党众议员；高良富，女，绿风会参议员；宫腰喜助，改进党众议员。他们是第一批不怕犯法推开中国大门的勇士！”

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所犯滔天罪行的仇恨，大家对友好接待日本人有些想不通，廖承志循循善诱说：

“按毛主席、周总理指示的去做吧！要往远处看，要区别政府和人民，当年日本政府中央决定政策的官员是有罪的，人民是无辜的，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一定会由涓涓之水变成滔滔洪流！”

廖承志和南汉宸研究决定，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谈判，中方由冀朝鼎、倪蔚庭主谈，孙平化、肖向前负责接待工作，把日本客人请进北京西城区宣武门附近头发胡同的一座小四合院里，同吃、同住、同活动，孙平化及时把有关情况报告廖承志，廖承志定期向周总理汇报谈判进程。

廖承志安排完毕，就奉命再次前往朝鲜战场，带领一些世界著名科学家搜集美国实施细菌战的证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美国在朝鲜战场和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罪行。

廖承志从朝鲜战场归来，马上召见孙平化听取汇报，得知谈判遇到巨大障碍，几乎无法继续进行，廖承志急忙询问症结所在。

原来，中方认为中国急需的是建设重工业的生产资料，而日方由于受到由美国操纵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和《巴特尔法》的限制，短时间内只能提供生活资料，否则就会成为“气球广告”，“让猫闻闻干松鱼之味道了”。

廖承志着重了解日方代表的意见，高良富是个博学之才，认为应该从现在可以成交的生活资料商品着手实施，通过这些商品

的等价交换，双方的理解就会加深，两国国民的认识也会提高，政界的误解亦会逐渐消除。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国民打破《巴特尔法》的运动发展起来，生产资料的输出才有可能；而且日中友好协会和日中贸易促进会已经发起向日本实业界、政界、文化界、劳工界及农业协同组合的进言活动，“号召用全体日本国民的力量实现日中贸易，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并向在北京的三位议员发出电报，希望他们与中国缔结日中贸易协定”。

廖承志得知在日方三代表中，高良富和宫腰喜助是社会活动家，不太熟悉经济问题；而帆足计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战前即以经济界的反战人士著称，曾经被关进监狱，现在仍然认识日本经济界许多权威大家，又是社会党众议员，因此在三个代表中发言权较大，日方由他主谈，高良富最年长而谦逊，非常器重帆足计，廖承志就同冀朝鼎更多地与帆足计接触，虚心地向他讨教，果然取得较好的效果。

经周恩来批准，双方终于达成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52年6月1日，隆重的签字仪式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大厅举行，南汉宸代表中方签字，日方由三位议员分别代表自己所在的三个民间贸易团体在协议上签字。

双方代表热烈握手祝贺，南汉宸、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激动地发表讲话，共祝中日第一次民间贸易谈判取得成功。廖承志满面笑容向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表示祝贺，认为虽然往返金额不过各3000万英镑，但是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中所开列向中国出口的甲、乙类物资清单基本上是美国对中国的“禁运货单”，撬开了美国封锁、遏制中国铁门上的一道缝，就在被它军事占领的日本打开了“封锁禁运”的缺口，堪称带有政治意义的经济协议，或者说是一个开启二战后中日民间经济外交活动的协议，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帆足计掏出他写的一首诗歌交给廖承志，说明这是三位拓荒



者的信念，也是他们的共同期望，今天通过中日双方人士的共同努力终于实现了，帆足计感慨万千地说：“我们三个终于从战战兢兢的木桥上，渡过了溪流峡谷！”

廖承志打开一看，题目是《谁也不能挡住春天的来临》，写得颇有感情，就风度翩翩鼓励道：“鲁迅先生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三个日本客人兴高采烈告辞准备回国，廖承志请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传达两个口信：一个是向因在日本分发《人民日报》事件而被美军大阪军事法庭判刑的日中友协大阪支部事务局长坪井正、事务负责人平井巳之助、工作人员山口和子、因以证人身份作证而被捕的小泽正元等先生，转达周恩来总理和他的亲切慰问，称赞他们是促进中日友好的忠贞斗士；二是请他们向日本各界著名人士石桥湛山、伊藤武雄、宫崎世民、内山完造、岛田政雄、长谷川敏三等先生问好，最后颇带感情地郑重表示：

“我们的周恩来总理要我请你们向这些先生转告，新朋友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忘记老朋友！”

廖承志很快获悉，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的签订，符合广大日本人民要求开展中日友好的迫切愿望，在东瀛引起轰动，因此在高良富三人回到日本时，像凯旋的将军那样，受到成千上万人的热烈欢迎，他认为这是冲破美国对新中国经济封锁的成功之举，搞日本工作更有信心了。

三、帮助日侨回国

1950年秋高气爽的新中国首都北京，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把刚从摩纳哥首都蒙特卡罗出席国际红十字会议的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卫生部长李德全和廖承志请来，共同商量帮助

日侨归国问题。

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侵华目的，把几百万日本人派到中国，根据日本侵华战略需要，参与控制中国的铁路、公路、矿山、航运等要害与资源部门，中国各大城市的重要或环境优美地区，许多被划为日本人住宅区，不准中国人居住，特别组建所谓“满蒙开拓团”进入中国东北，进行殖民性垦屯，仅在东北即有100万之众，例如长春的南湖公园和关东军总司令部周围地区，沈阳的大西路和万象公园及旅大、锦州，日本特务、警察、浪人监视镇压中国人民的爱国行动，欺压中国老百姓，并且贩卖鸦片，开设赌场、烟馆、妓院，无恶不作。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从大连等地将大批日侨遣送回国，但是由于在华日本侨民太多，又居住分散，遣送日侨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很快又被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所打断，以至于还有数万日本侨民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仍然在中国工作或生活，有的还参加了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但是，他们毕竟是日本人，自然希望归国生活，这种要求是正当的，周恩来和廖承志认为有责任帮助他们，中国政府对在华日侨业已进行调查，准备在适当时机继续遣送，只是由于美国把新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之外，日本政府又与蒋介石集团签订日蒋条约，两国之间未能结束战争状态，致使中日两国在日侨归国问题上无法对话，日侨回国问题未能解决。

由于当时中国与日本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政府之间无法来往，周恩来让中国民间团体出面承担这一工作。

早在几个月前，周恩来就指示李德全在应邀出席在摩纳哥首都蒙特卡罗举行的国际红十字会会议期间，主动寻找解决在华日侨问题的机会。恰巧在一次午餐会上，李德全遇到了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两人进行交谈，岛津忠承试探着请求中国红十字会帮助寻找日本红十字会救护班332名在华日本人的下落，最



好告知在华日侨的情况。

李德全还是第一次听说日本救护班的情况，想到周恩来总理的嘱咐，便从人道主义和红十字会的义务角度回答道：

“这虽是旧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我回去以后马上进行调查，我愿按你的希望去努力。”

岛津忠承从日内瓦带回中国方面有关在华日侨归国问题上的善意喜讯，立即在日本各界人士特别是日侨在日本的亲属中引起强烈反响。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等团体主动与日本红十字会联合起来，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接日侨回国。

李德全回到北京后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便把廖承志请来一起商量解决方案。廖承志说他不断接到日中友协朋友们的来信，要求帮助寻找亲人的下落。日本政府却诬蔑中国方面在帮助日侨回国问题上“没有诚意”，胡说“共产党国家不讲人道”。

为反击日本政府的诬蔑攻击，满足日侨回国的愿望，周恩来要廖承志提出一个一揽子计划，予以全面解决。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联系方式是个问题，廖承志便在1952年12月1日以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方面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的形式宣告：“中国政府向来愿意协助自愿回国的日本侨民返回日本，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有不少日侨回国，但因在这方面缺乏船只又遭到阻难，因此多数愿意回国的日侨，现在还不能达到他们的愿望。只要日本方面有办法解决船只问题，我国人民政府和人民极愿努力协助日侨回国。凡愿意回国的日侨按一般外侨出境手续办理出境申请，中国政府一定机关发给证明后即可出境。”

廖承志与有关方面反复商量，决定在北京通过对日广播的形式宣告：中国有三万名日本侨民，他们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生活安定。对于希望回国的日侨，中国政府愿予以援助。有关具体问题，日本的适当机关或人民团体可派遣代表与中国红十字会协